

● 东·华尔丹 (北方民族大学 文史学院, 银川 750021)

## 略论藏族历史上布顿大师对藏文文献目录学的贡献

[关键词] 藏传佛教; 藏族文化; 布顿大师; 藏文文献目录

[摘要] 藏文文献的整理和目录的编纂在印度佛教传入吐蕃、藏文字创制和佛经进行翻译后就逐渐开始了, 在藏传佛教后弘期不但掀起了更大规模的译经运动, 而且名家辈出, 布顿大师就是翻译、著述、文献目录的编纂整理方面杰出的人物, 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对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 G257

[文献标志码] E

[文章编号] 1005-8214(2010)06-0088-04

### 1 佛教的传入和藏文文献目录学的缘起

藏文文献目录学的缘起与印度佛教的传入、藏文的创制以及大规模的佛经翻译运动有密切的联系。约公元4世纪吐蕃王朝第二十七代赞普拉脱脱日年赞时佛教传入吐蕃, 据《红史》记载: “拉脱脱日年赞六十岁时, 从空中落下一肘高的黄金宝塔、大乘庄严宝王经、百拜忏悔经、六字大明心咒、赞达嘛呢泥塔、木叉手印等物, 并有声曰: ‘五代以后将会懂得其意义。’……据说这是佛教在西藏的开始。”<sup>[1]</sup> 这些佛教法器和典籍, 被称为神秘的“年波桑娃”。此外, 《嘛呢宝训集》《西藏王统记》《佛教史大宝藏论》《青史》《新红史》《柱间史》《娘氏宗教源流》等藏文典籍也有类似的记载。因这一时期吐蕃没有统一的文字, 不具备翻译各种经文的条件, 因此吐蕃王室将这些宗教礼品作为神物供在雍布拉康宫内。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继位执政, 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开疆拓土, 加强经济、文化交流, 使吐蕃呈现出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社会得到进一步发展。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公主赤尊公主和唐朝公主文成公主, 修建大小昭寺供奉两位公主带来释迦牟尼八岁和十二岁等身像以及大量的佛教

典籍。同时, “由于收他国进贡礼物须阅读文件, 那时西藏没有文字, 特派遣‘吞米阿努’的儿子(即图弥桑补扎)和随行人员一行16人赴印度去学习文字。他们在印度拜班智达‘拉日巴生格’(神明狮子)座前学习了《声明》, 而与西藏原有语言配合起来, 总摄为三十个辅音字, 以及阿和四个元音字, 并参照‘迦湿弥罗’的字体, 在拉萨的玛如堡, 出西藏文字和《八种声明论》。”<sup>[2]</sup> 之后, 开始了新藏文的学习并迎请印度的格萨拉大师和婆罗门香噶热、尼泊尔的项德尔、迦湿弥罗(即克什米尔)的达努、汉僧大天寿和尚等高僧大德到吐蕃, 与吞米桑布札以及助手把《集密宝顶陀罗尼》《月灯》《宝云经》《十万般若波罗蜜多经》《大方广佛华严经》等多部佛经翻译成藏文。译经的开始, 标志着佛教开始在吐蕃正式传播。

公元766年赤松德赞请莲花生大师选址修建桑耶寺, 公元799年建成, 请寂户、莲花生和众大臣等参加开光。不久, 从印度迎请说一切有部持律比丘12人到吐蕃, 由寂户等班智达为巴赛囊、桑希、玛仁青乔、昆鲁益旺波、巴赤桑、恩兰嘉哇却央、白惹杂那7名吐蕃贵族子弟剃度受戒出家, 史称“七试人”。其后, 更多的吐蕃人出家修习佛法, 留学印度。创办译场, 并从印度、迦湿弥罗、于阗、汉地迎请许多大班智达, 将能得到的佛经大都翻译到吐蕃, 如说一切有部、律藏、经藏和部分密教等方面的著作4000多部, 藏文《大藏经》的内容基本形成雏形。此时的译师有千人之多, 其中, 来自外地的大班智达有9人, 班智达有92人, 从而掀起了藏传佛教前弘期大规模的翻译运动, 对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公元9世纪赤德松赞时期, 组织人力先后将山南地区的佛经搜集整理, 还统一译语, 修订旧译, 规定每部经文的数量和篇幅规模, 编订成函。这一时期, 辑成了第一部藏文《大藏经》目录——旁塘目录, 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秦浦目录和丹噶目录。由于朗达玛灭佛和吐蕃王朝的崩溃, 佛教经典也遭到空前的毁灭, 仅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青藏铁路建成与藏族文化和谐发展研究》(批准号: 07XMZ006)研究成果之一

有丹噶目录保留下来,其中收录了经论六七百种,分为27个门类,后收于《丹珠尔》中。公元10世纪以后主要从东部安多地区和西部阿里地区率先掀起复兴藏传佛教的运动,史称藏传佛教“后弘期”。陆续出现了许多教派,有宁玛派、萨迦派、噶当派、噶举派、格鲁派、希解派、觉宇派、觉囊派、夏鲁派等。这一时期,在佛经的译校和理论探索过程中,古格王朝的大译师仁钦桑布(958—1055)作出了巨大贡献。他13岁剃度出家,多次赴印度、克什米尔地区,曾经拜75名佛学大师系统学习佛教显密教法,85岁时曾拜阿底峡尊者为师学习密宗,取得很高的成就,他对藏传佛教后弘期的最大贡献是佛经翻译和修订。“据说他一身翻译了17种经、33种论、108种怛特罗(密宗经咒),达及显、密两宗,史家将其翻译的密宗称为‘新密咒’,以别于在他以前翻译的‘旧密咒’。”<sup>[3]</sup>大量佛经的翻译和分类整理,为系统的藏文文献目录学的形成创造了条件,编纂、修订藏文《大藏经》已经成为藏传佛教发展和理论研究的必然。“佛经的数量多了,自然就有对所译出来的佛教经典分类整理和编排目录的必要,于是编纂藏文《大藏经》总目录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sup>[4]</sup>在这一领域,后藏日喀则地区的寺院纳塘寺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在藏传佛教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纳塘寺是最早编纂、修订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的寺院,所以这部大藏经叫纳塘版,纳塘寺也以此著称于世。”<sup>[5]</sup>元武宗海山时代(1308年—1311年),国师尊巴坚央委托前藏欧巴·洛赛益西等搜集各地抄本,编纂成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部抄本,并分别编写了两个目录,存放于纳塘寺,成为以后各种版本《大藏经》的蓝本。这就是藏族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藏文《大藏经》缮写本。而此时韬光养晦的夏鲁派创立者、佛学泰斗布敦·仁钦珠在公元1322年撰写了《佛教史大宝藏论》,其后又应蔡巴·贡嘎多吉的邀请对纳塘抄本《大藏经》进行了重新整理、分类和编目工作,显示了精深的佛学造诣和对各教派教法、历史的准确把握,成为藏文文献目录学领域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切智布顿大师”。

## 2 布顿大师对藏文文献目录学的主要贡献

藏文《大藏经》是一部具有百科全书性质的藏文佛教经典超级丛书,收录了大量的佛教典籍和其他文化典籍。藏文《大藏经》分“甘珠尔”和“丹珠尔”两大部分,其中,“甘珠尔”藏语意为佛祖之教典,包括显、密经藏和律藏的一部分内容,涉及律部、般

若部、华严部、宝积部、经部(分大乘经与小乘经)、秘密部(分十万怛特罗部、古怛特罗)及总目录等。“丹珠尔”意为“论述部译文”,即佛陀释迦牟尼的弟子及大师们对佛语的阐释、注释书、密教仪轨、记传、语言、文字等,包括论和一部分律,包含涉及哲学、逻辑、文学、语言、艺术、天文、历算、医药和建筑等大小五明学科。纳塘抄本《大藏经》的问世对佛教文化乃至世界的贡献是巨大的,而布顿大师则凭借自身睿智和勤奋努力,通过他丰硕的著述以及对纳塘抄本《大藏经》的审定、校勘,把藏文文献目录学提升到了更加规范、科学和系统的理论和实践高度。

布顿·仁钦珠诞生于藏历第五绕迥金虎年(1290年),卒于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是夏鲁派(又叫布顿派)的创始人,他修学兼优,精通五明,知识渊博,研修了当时藏传佛教中各教派所有的显密教法,30岁左右佛学思想已经圆满成熟,开始从事讲经、著述、翻译和编订大藏经等工作。公元1320年夏鲁寺重建后,他受古香·扎巴坚赞之邀出任夏鲁寺住持,传授佛法。公元1322年写出了名著《佛教史大宝藏论》,这部佛教史历史专著以翔实的史料,精辟地论述了印度佛教和在西藏传播与发展情况,明辨各宗,有理有据,正确地解释了显密佛学的纲要。这部著作分为三大部分:第一总纲为明闻、说正法的功德;第二总纲为明所闻、说之法;第三总纲为如何闻、说及修学法;第四总纲为所修之法如何而来的情况,包括来到西藏弘扬正法事业的93名班智达和包括吞米桑布札在内的西藏192名大译师名单。尤为重要的是,这一总纲在正法传到西藏的情况叙述结束后,用大量篇幅笔墨编写了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的总目录。“该部分内容是布顿大师在《丹噶目录》、《钦浦目录》、《旁塘目录》那塘甘珠尔目录和鲁梅·楚臣喜饶等大师编撰的《显密经典分类和并列目录》的基础上,加入后期译本和各寺院所藏译本而未入目录者之后,才最后编定的。因为它全面地反映了元和元以前西藏佛经翻译的全貌,而且由于布顿当时所利用的几种重要目录,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因而更增加了它的重要性。”<sup>[6]</sup>到藏历第六绕迥木狗年(1334年)夏鲁万户长古香·贡噶顿珠任施主,编写一套《丹珠尔》写本,邀请布顿大师担任校订。布顿大师从卫藏大小40多个寺院里搜集到大量的译经和后世的经疏、论述,亲自翻译一些尚未译完或完全没有译文的经论,增加了原纳塘版《大藏经》未收录的章节1000种并亲自编写了目录,成为《丹珠尔目录宝

鬘》。后来《丹珠尔》的几种版本基本上是以此为蓝本,根据他编订的次序刊刻印制的。

此后,《红史》的著述者、蔡巴万户长蔡巴·贡嘎多吉聘请布顿大师参与主持蔡巴《甘珠尔》的编定审读,以纳塘写本《甘珠尔》为蓝本,其他写本做参校,勘校后,以金银汁混合书写了260函目录《新造佛说甘珠尔之目录——白册》,史称《蔡巴甘珠尔》。到明永乐八年(1410年),明成祖朱棣派专使进入西藏,将藏文《甘珠尔》写本带回南京,以铜板模印《甘珠尔》《丹珠尔》。以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先后雕版印制了理塘版、北京版、卓尼版、德格版等不同版本,迎来了藏文《大藏经》的繁荣期,同时也使布顿大师在藏传佛教史和文化史上占据了突出的历史地位。公元1364年,扎捺巴鞞真南监收集布顿大师的全部著、译经论,划分成27帙200多种书,并为其编排了《目录宝贝钥匙》,成为珍贵的佛教史资料。

作为一种知识的分类学,目录学主要是将著作、书刊、文献等分门别类进行与登记,避免互相混淆,以便于管理和读者有效使用。“藏文中的目录,是指它如同晴朗白天的物体影像一样具有清晰可见的特点,又像用能清楚标明草的名称类别的绳子束起来的草捆,目录即因此而得名。藏文文献编目的7条绳子是:(1)所属类别。(2)文献题目。(3)作者姓名。(4)章节数量。(5)函数。(6)叶数。(7)是否完整。”<sup>[7]</sup>在藏文文献编目方面,布顿大师的编排方法主要是部类的区分法和次序的排列法,部类以文献的内容为基础划分,大体上以大小五明为干支。编纂《大藏经》时,先分出《甘珠尔》《丹珠尔》两大类,再以论述内容分为显宗、密宗两类,显宗分为经、律、论三部分,密宗分为事部、行部、瑜伽部、无上瑜伽部四部分,加上密宗总续共8类。8类之外以因明、声明、医方明、工巧明、小五明(修辞、辞藻、韵律、戏剧、星象学)等著述17类,再加全集和零散著作共19个大类。在此大类之下再分小类。在实际应用方面,这种传统的藏文文献编排方法,至今仍然是寺院和藏学研究场所主要的藏书、编制目录以及对文献的管理方式,并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经过改进和理论创新,形成了多种藏文文献的图书编目与管理方法。

从这个意义上讲,布顿大师著述以及对藏文《大藏经》的编纂,对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3 结语

卷帙浩繁的藏文大藏经的质量在佛经译本中是首

屈一指,而所收的经典的种类也是最为齐全的,堪称是世界佛教文化的瑰宝,藏文《大藏经》目录是藏传佛教文献的瑰宝,而布顿大师编撰、校订的大藏经分类目录更是弥足珍贵,也因此奠定了布顿大师在藏传佛教领域佛学大师和文献目录学大师的崇高地位。如果我们认真梳理和审视,就可以感受到这一过程给我们的深刻启示。首先,布顿大师卓越的成就是在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氛围通过艰苦修行和从小认真的学习才逐步取得的。他的“父亲是一名宁玛派的高僧,母亲在佛学领域也有一定造诣。布顿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五六岁时就开始在母亲身边习读《临终智慧经》、《地藏十轮经》等经文,7岁时在卓浦巴处学习《大乘菩萨之发心》,8岁时跟随祖父宁玛派大师次成贝桑布学习《大圆满心识》、《大圆满法界部》等宁玛派的密法,后又听讲希解派的外续怛特罗和莲花生大师的‘伏藏’等18部怛特罗密典。所以,布顿在他的童年时期,就精通了宁玛派教法,当时有‘神童’之称。布顿一直没有放松对佛学的学习,从17岁开始又广拜名师潜心学习‘三藏’、‘五部大论’,尤其学习《八千般若颂》、《两万颂般若注解》、《入行论》,同时修习《沙弥律议》、《律经根本律》等,听受《十诵律比丘戒本》、《戒律根本经》、《律仪发心》、《行菩提心》等所有律部经典和修心教法。布顿18岁正式出家受沙弥戒,23岁受比丘戒,其学法次第、修习仪轨都严格按照佛教正统理论。因此,布顿不仅学识渊博,而且佛学基础扎实,到30岁左右已经博通藏传佛教各宗派诸如宁玛派、萨迦派、噶当派、噶举派、希解派和觉域派的教法仪轨,在学业及其佛学思想等方面已经圆满成熟。从此布顿成为一名大师级的高僧,开始到各地宣讲《波罗蜜多经》、《因明学》、《大乘阿毗达磨集论》等佛教深奥义理,从而名声大振。”<sup>[5]143</sup>正因他遍修显密,成就巨大,对西藏佛教的主要宗派主要教义、教规都曾作过潜心的修习,广闻博问,为他以后藏文《大藏经》的编纂工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其次,谦虚的学习精神和博大的胸怀使他不拘泥于某一教派思想和理论,从而能够集思广义,不断创新精进,不断著述、校译佛教经典,成为“一切智”。向他求法的僧人来自卫藏、阿里、朵甘思、朵思麻、汉地、印度、尼泊尔、布鲁克巴、蒙古、畏兀尔等许多地区。当时在夏鲁寺求法修行的僧人有3800名,整个夏鲁寺就有160余个怛特罗和因明学院,成为卫藏的一个教法中心,这要归功于布顿大师的学问和德行。再次,他拥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严密的逻辑



思维能力和严谨的治学精神,这使布顿大师具备了研修文献目录学的能力和条件,在对藏族传统文献目录学学科、知识的分类上有自己独特的原则和规范,从而使他成为一颗璀璨的明星和楷模。最后,藏文文献目录学主要集中于对佛教文献的认识、分类和管理。虽然元明以后,藏文文献目录学沿袭着传统继续发展并逐渐完备,出现一些藏书量巨大的寺院的藏书目录和上师全集目录。但是笔者在藏区作田野调查时发现,在藏区逐渐步入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也受到强烈冲击,尽管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进行保护发掘、抢救,仍然有大量的手写本藏文文献被淡漠乃至遗忘,而许多手抄本并未收录于各种版本的藏文文献目录中,但具有难以估量的学术价值。因此,对这部分数量庞大的文献进行抢救性整理、校译和编目就显得非常重要,从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布顿大师治学、研修精神的弘扬,也是现代背景下推进藏文文献目录学不断发展的一次尝试。

#### [参考文献]

[1] 蔡巴·贡噶多吉著;东嘎·洛桑赤列校注.红史

(上接第79页) 美元的信息”。图书馆联盟已经由来已久,并且促进了图书馆服务质量的提高。不管联盟属于当地的、全国性的还是地区性的,都会有益于合作各方,都对图书馆有所帮助。

#### 2.6 学术搜索引擎

要接受免费的学术搜索引擎,例如 Google Scholar (见 <http://scholar.google.com/>)、Google News Archive (见 <http://news.google.com/archivesearch/>)、Find Articles at BNET (见 <http://findarticles.com/>)、MagPortal.com (见 [www.magportal.com](http://www.magportal.com/)) 与 Yahoo! Search Subscriptions (见 <http://search.yahoo.com/subscriptions>),一些特定学科搜索引擎,包括 AgeCon Search (<http://ageconsearch.umn.edu/>)、Scirus (见 [www.scirus.com/](http://www.scirus.com/)) 与 Intute (见 [www.intute.ac.uk/](http://www.intute.ac.uk/)),这些搜索引擎中的一些不仅允许用户搜索定期出版物,而且可以链接到免费全文本。这些搜索引擎极为有用,因为即使在线订购索引也非常昂贵。花费大量经费购买索引,不如将这部分资金转到全文本资源上更好。

#### 2.7 开放资源

电子资源相关的成本不只是资源本身,也包括资源管理费用。图书馆所使用的管理电子资源的系统与资源本身一样昂贵。开放资源项目诸如 iVia (见 [\[M\].陈庆英,周润年译.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31.](http://</a></p></div><div data-bbox=)

[2] 布顿大师.佛教史大宝藏论 [M].郭和卿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169.

[3] 丹珠昂奔.藏族文化发展史(下册) [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773.

[4] 王辅仁.西藏佛教史略 [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184.

[5] 尕藏加.西藏宗教 [M].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

[6] 李冀诚.西藏佛教夏鲁派祖师布顿大师及其著述 [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9(4):32-39.

[7] 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 藏文文献目录学 [M].陈庆英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87.

[作者简介] 东·华尔丹(1967—),男(藏族),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藏学和文化哲学研究。

[收稿日期] 2009-10-02 [责任编辑] 张京生

ivia.ucr.edu) 与 LibX (见 [www.libx.org/](http://www.libx.org/)) 有助于机构低成本管理这些电子资源。要利用 The Open Source Systems for Libraries (见 [www.oss4lib.org/](http://www.oss4lib.org/))、Sourceforge.net (见 <http://sourceforge.net/>) 与 OpenSourceInitiative (见 [www.opensource.org/](http://www.opensource.org/)) 发现与查找其他有用的软件和信息。

#### 3 结语

我们可以认为,紧张的预算对于我们是一个挑战,它迫使我们对于藏书进行创造性建设。因为相关费用很少,所以我们必须确保我们所获得的或者租用的电子资源真正地我们的藏书建设要求相一致。我们的藏书建设政策从来没有如此重要。确实,处理电子资源会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但是,充分利用这一资源的益处却是巨大的。正像我们建设印刷本藏书一样,我们需要研究、规划、发展我们的电子资源,以藏书建设政策作为指导,发现图书馆有用的资源。

(译自 Apryl Price. Collection Building, 2009, 28 (1): 31-34)

[译者简介] 王岗(1966—),女,宁夏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发表论文多篇;任蕊(1978—),女,宁夏图书馆助理馆员。

[收稿日期] 2009-12-31 [责任编辑] 邵晋蓉